

《白鹿原》研究

郑万鹏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国防大学 2 065 8765 6

64856715

《白鹿原》研究

郑万鹏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白鹿原》研究

作 者:郑万鹏

责任编辑:王志茹

责任校对:文 欢

装帧设计:施京华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开 本:850×1168毫米 32开

字 数:200千字

印 张:7.75

版 次:1998年7月第1版

印 次:199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0000册

书 号:ISBN 7-5387-1272-0/I·1219

定 价:15.00元

目 录

理论篇

梁漱溟文化思想与《白鹿原》研究.....	(1)
----------------------	-------

结构分析

《白鹿原》的史诗构造

——与托尔斯泰长篇艺术比较谈.....	(14)
《白鹿原》象征世界.....	(20)
《白鹿原》人物美学.....	(27)
《白鹿原》的叙述艺术.....	(36)

历史解说

儒学治下的社会生活图画

——《白鹿原》中的传统中国.....	(46)
翻“鏊子”的悲剧	
——《白鹿原》中的中国现代历史.....	(61)
不废长江万古流	
——《白鹿原》中的当代中国.....	(76)

人物论评

白鹿的迷失

——论白灵	(85)
阶级本位文化的化身：鹿兆鹏	(91)
我们都是黑娃	(98)
“有幸与不幸”的小娥	(104)
泉雄白孝文	(110)
中国农民白嘉轩	(117)
村夫野老鹿三	(124)
又一农民鹿子霖	(130)
白鹿精魂朱先生	(136)
《白鹿原》的“亮点”——鹿鸣	(146)

文化解读

《白鹿原》家族文化	(149)
《白鹿原》儒家文化	(157)
《白鹿原》哲学文化	(165)
《白鹿原》婚姻文化	(172)
东、西文化冲突中的《白鹿原》	(179)

文学史纵谈

《白鹿原》：中国 20 世纪文学的总结…………… (200)

附：① 陈忠实访谈录…………… (219)

② 《白鹿原》研究资料索引…………… (231)

后记…………… (239)

梁漱溟文化思想与《白鹿原》研究

《白鹿原》在重新构筑历史以及重新塑造民族精神时,表现出与“新儒家”的领袖人物梁漱溟惊人一致的见解,甚至“白鹿精魂”朱先生形像一生的“生命轨迹”像是梁漱溟儒家人生的投影。了解梁漱溟的文化思想,建立多元的文化观,是《白鹿原》研究必要的理论准备。

青年梁漱溟步入社会之际,正值辛亥革命过后。面对军阀混战,国无宁日,民不聊生之惨状,他写下《吾曹不出如苍生何》(1917)。文章列举“法律之破坏”、“统一之破坏”等社会问题,指出这些问题形成的根源,探讨解决的途径。文章反复呼吁“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并表示坚信“吾曹果出,大局立转”,表现出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随后,梁漱溟由先前对印度佛教出世思想的倾心,转变为对儒学的信仰。以此为发端,在20世纪的风风雨雨中,展现了儒家的人生。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各个严重时刻,都发出非凡的巨响,形成一套完整的文化思想,成为当代“新儒家”的先驱、领袖。

梁漱溟选择儒家人生出于一种历史的责任。在内忧外患面前,“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看到的是辛亥革命失败于缺少思想革命的深度,于是掀起了一场文化运动,动摇民族文化的根基,在深刻的文化层面彻底地学习西方。原本无心著书立说的梁漱溟就是在“全盘西化”的一片鼓噪声中出来阐释儒学、阐释东方文化精神、参与东西文化大论争的。梁漱溟的“新儒家”文化理论创立伊始就是经世致用的,就体现出强烈的动态。东西文化大论争既是中国现代历史的动因,又纵贯中国 20 世纪,成为中国 20 世纪文化发展的总主题。

梁漱溟的文化理论首先是针对新文化运动“全盘西化”主张的。他认为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和对西方文化的引进,都不是在枝节而是在根本意义上。他说:“《新青年》陈独秀他们几位先生”的意思是“要想将种种枝叶抛开,直截了当去求最后的根本。”^①他明确指出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文化运动”是要将东方文化用西方文化“根本的通盘换过”^②。他看到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实行的是革命性措施:“‘五四’新文化运动,直向旧礼教进攻,而后探及根本,中国乃真革命了。”^③而一国文化与该国命运的关系,文化革命的结果,梁漱溟认为孟德斯鸠的一句话说得中肯:

礼俗者何?所习惯而公认为不可叛者也。

①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 1 卷,山东人民出版社,第 334 页。

②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 1 卷,山东人民出版社,第 334 页。

③ 《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 3 卷,第 225 页。

苟一旦认为可叛，则其国乃无一存。^①

梁漱溟运用平行研究的方法对东西文化进行比较。

他认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②。梁漱溟不静止地描绘一个民族“没来由没趋向”的“呆板的面目”，而要描绘出其“活形势”。^③他总是将文化融入历史，运用“历史——文化”的研究方法。他看到西方文化在古希腊“各方面全都发达”。^④但是从古罗马后期至近代则总是摇摆于禁欲与纵欲两极端，“宗教老是领着人梦想天国，以重视现世幸福为罪恶；先是偏于禁欲，所以现在又偏于纵欲”；“再如个人主义之发达，也是由于从前团体的干涉力太强而迫成的”。“西洋人从这边偏到那边，出于禁欲入于欲望，出于干涉入于放任，恰好没有一个中间”。^⑤他认为中国文化则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⑥他说：“中国人的思想是安分、知足、寡欲、摄生，而绝没有提倡要求物质享乐的；却亦没有印度的禁欲思想”，^⑦因此中国人“恰好是最少偏，恰好是在中间”。^⑧

通过比较，梁漱溟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在于两种“路向”的不同。他以此为前提，建立“中华本位”的文化理论。他认为：

① 孟德斯鸠《法意》第19卷第12章。

②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353页。

③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353页。

④ 同上，第402页。

⑤ 《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261页。

⑥ 《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383页。

⑦ 《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392页。

⑧ 《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261页。

“一民族真生命之所寄，寄于其根本精神，抛开了自家根本精神，便断送了自家前途。”^①他注重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结构的研究，认为民族的觉醒，就在于“觉悟到我们原来社会构造的特殊，觉悟到我们不能不自有我们的前途——虽然西洋的长处必要尽量地采用”。^②

梁漱溟充分肯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伦理和由此扩大的社会伦理。他说，中国社会“家庭骨肉之关系乃格外显著、紧密、重要；并以家庭恩谊推准于其他各方面，如经济生活上之东伙关系、教学生活上之师生关系、政治生活上之官民关系，一律家庭化之。——这就是中国社会的伦理。”^③他称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而西方近代是“个人本位的社会”。^④因此，他从“本位”的混乱上批评新文化运动对西方个人主义的引进。他认为西方近世“个人主义”发达，是由于从前团体的干涉力太强所造成的，是一个“极端”。而中国当时正需要的是“向心力”，西方“个人主义”思潮进来，“反增加了我们的‘离心力’。”^⑤

梁漱溟时时强调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风教文化的理性特征。他说：“宗教所必具之要素，在孔子不具备，在孔子有他一种精神，又为宗教所不能有。这就是他相信人都有理性，而完全信赖人类自己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什么事该作，什么事不该作，从理性上原自明白。一时若不明白，试想—想看，终可明

①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09—110页。

② 《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486页。

③ 《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74—175页。

④ 《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80页。

⑤ 《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206页。

白。因此孔子没有独断的标准给人,而要人自己反省。”^①他注意于《论语》所载“宰我居丧”(《阳货篇》)、“子贡欲去告朔之饗羊”(《八佾篇》)故事,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吾日三省吾身”等语录,证明儒学是内在的自觉,而非外在的禁诫。他认为孔子任直觉,仁即是直觉。^②他说儒家哲学也就是人类的“理性早启”。^③基于儒学“有见于理性,有见于人类生命,一个人天然与他前后左右的人,与他的世界不可分离”,^④因此多由儒家倡导而形成“以德代宗教,以礼俗代法律”^⑤的中国历史社会的伦理秩序。梁漱溟描述中国历史为“风度泱泱数千年”。^⑥认为二千年一治一乱循环的历史上“不能舍儒者和儒术而求治”^⑦，“儒家为治道之本”^⑧，“治道即是孔子之道”^⑨。在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声中,对传统文化一片虚无声中,肯定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肯定儒家在其中的作用,重新发现儒家文化中的“活东西”,给予现代阐释,回应对于儒学的挑战,正是梁漱溟文化思想的特色,“新儒家”的基本品格。

梁漱溟将重理性的中国文化与重理智的西方文化相比较,探求二者对于生命的不同意义,“中华本位”的文化理论逐渐确

① 《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105页。
②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4章。
③ 《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236页。
④ 《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136—137页。
⑤ 《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198页。
⑥ 《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175页。
⑦ 《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211页。
⑧ 《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216页。
⑨ 《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210页。

立。在理性与理智二者之间,他更重视前者。他说:“以理智为人类的特征,未若以理性当之之深切著明,我故曰:人类的特征在理性。”^①在他看来,“理性是生命本身,是体;理智是生命的工具,是用。”^②因此,他认为只有以重理性的东方文化精神奠定生命本体,才能学习西方的智用,“才可以真吸收融取了科学和德谟克拉西两精神下的种种学术种种思潮”。^③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④。因此,1920年他在一片民族文化虚无无声中发出预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⑤

梁漱溟积40年社会生活经历,在内战外侵年代,中国问题极其严重之秋,经过对中国历史、社会结构的研究,提出了“中国有没有阶级”这样事关重大的问题,并且对此阐发了鲜明、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在中国这样的农业社会,要讨论其有无阶级,那么土地分配问题应为关键所在。而他长期、大量调查的结果是:在中国“土地自由买卖,人人得而有之”;“土地集中垄断之情形不著;一般估计,有土地的人颇占多数”,^⑥如山东邹平全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有土地,河北定县也如此。这样,中国两千年来状况是:“独立生产者之大量存在。此即自耕农、自有生产工具之手艺人、家庭工业等等。”^⑦“土地和资本皆分散而不甚集

① 《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126页。

② 梁漱溟:《几个问题的讨论》,转引自艾恺(美)《最后的儒家》,江苏人民出版社,第191页。

③ 《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539页。

④ 《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526页。

⑤ 李渊庭、阎秉华《梁漱溟先生年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9页。

⑥ 《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146页。

⑦ 《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155页。

中,尤其是常在流动转变,绝未固定地垄断于一部分人之手。”^①由此,梁漱溟论述道:“可以说,秦汉以来之中国,单纯从经济上看去,其农工生产都不会演出对立之阶级来。”^②因而“不妨说它阶级不存在”。^③梁漱溟的结论是:中国不是“阶级对立”的社会,而是“职业分途”的社会。^④

梁漱溟研究中国历史社会有无阶级对立的同时,也对秦汉以后两千年间有无“封建社会”给予研究,参与中外学者对此所作的讨论。梁漱溟认为在中国,“封建秩序”于秦汉后已解体,^⑤“伦理之代封建为新秩序”^⑥。突破了西欧“封建社会”模式,解构了关于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的理论。

梁漱溟通过比较研究发现的中西之间最大的差异就是由事关重大的前提——中国历史社会无阶级对立,秦汉以后“封建解体”——而导致的事关重大的结论:中国历史社会亦无革命。

梁漱溟认为西方屡屡发生一个阶级向另一个阶级发起斗争的革命,有其社会结构上的根源。西方社会是“阶级对立”的社会,“一个人生在阶级社会里,其一生命运几乎就已决定了。特别是封建社会为然,而资本社会亦不例外。农奴固然不能转为贵族,劳工亦难得作资本家。他们若想开拓自己前途,只有推翻这种秩序,只有大革命。”^⑦因此,“西洋自有基督教以后,总是过着

① 《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156页。

② 《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151页。

③ 《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155页。

④ 《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156页。

⑤ 见《中国文化要义》第9章第3节“中国封建之解体”。

⑥ 《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118页。

⑦ 《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191页。

集团而斗争的生活”。^①梁漱溟的结论集中为一点就是：“阶级对立，正是集团间的产物，不发生与伦理社会。”^②中国社会由家庭生活推演出伦理本位，同时也就走向职业分途，一个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初无限制，尽可自择，富贵贫贱，升沉无定，政治上、经济上机会开放，人人各有前途可求，进取心普遍地得到鼓励。因此，中国社会有阶级融解，而无阶级对立，“不能产生西洋式的政党或革命党”^③，亦不见西洋式的革命，“伦理本位就是这样藉职业分途为配合，得以稳稳行之二千余年，得以通行到四方各处”。^④

中国历史上的“治”与“乱”，梁漱溟将其归于伦理的得与失。秦汉后，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之社会结构渐著，顺此方向，则条理昌明，而为治世；悖此方向，社会结构遂为破坏，失其相安条件，便成乱世。此乱世，“迫害杂来，纷扰骚乱，不同于阶级革命有其一定之要求方向，及其划然之壁垒分别，”^⑤并且社会构造尽或一时破坏失衡，但不久又得恢复而显现其效用。可以说“中国历史自秦汉后，即入于一治一乱之循环，而不见有革命”。^⑥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阶级”、“封建”以及“革命”的研究所得，可谓梁漱溟文化思想的精髓，也是最为“经世致用”之处。

既然中国历史上只有一治一乱的循环而无革命，那么梁漱

① 《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58页。

② 《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189页。

③ 《乡村建设理论提纲初编》，《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046页。

④ 《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191页。

⑤ 《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209页。

⑥ 《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219页。

溥进而分析中国 20 世纪自辛亥革命开始的国民革命,认为是“自外引发的文化改造、民族自救,而不是由社会内部矛盾所爆发的阶级斗争”。^①他还于 1930 年指出:“中国近三十年一切改革或革命大抵出于所谓‘先觉之士’主观上的要求,而很少是出于这社会里面事实上客观的要求”。他将此看作“贻误”。^②他相信:“抛开自家根本固有精神,向外以逐求自家前途,则实为一向的大错误,无能外之者”。^③

梁漱溟在对历史社会研究中,看到了“士”阶层独特的地位和使命。他指出,“士”不属于某阶级,“士人无恒产,不代表经济势力”,^④它是“阶级融解下之产物”,其使命是“力促阶级之融解”。^⑤他以孔子私人讲学“有教无类”为有力证据,说此乃“学术平民化之开端”,“并为后世开布衣卿相之局”。^⑥

梁漱溟一生恪守中国自古以来士人的传统使命,自觉地保持士人的独特地位,在集团斗争激烈的 20 世纪中国,以超然的现代儒士形像致力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和解与社会的建设。

面对辛亥革命之后由军阀割据造成的社会混乱,梁漱溟著文指出这是由“政治上之武装的势力所作成”,断言“武装势力即是乱源”,而解决问题的途径则是“一言以蔽之曰非战,曰组织国民息兵会”,传播“非战主义”,要求各方“罢兵”,“永不许战争见

① 《乡村建设理论提纲初编》(《梁漱溟全集》第 5 卷,第 1040 页。

②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梁漱溟全集》第 5 卷,第 82 页。

③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梁漱溟全集》第 5 卷,第 106 页。

④ 《梁漱溟全集》第 3 卷,第 179 页。

⑤ 《梁漱溟全集》第 3 卷,第 175 页。

⑥ 《梁漱溟全集》第 3 卷,第 176 页。

于国内”。^① 这是梁漱溟一生非“斗争”、主“调解”，轻“破坏”、重“建设”思想的最早表现。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梁漱溟不接受外来的阶级革命模式。他“不承认有任何理由任何名义可以对内作战”。他认为“中国问题根本不是对准革命，而是改造文化，民族自救”。^② 在内战外侵、民族危难的年代，他仍然高举建设的旗帜，以乡村建设运动进行社会改造，支持抗日救亡，成为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家和领袖。他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是建设社会组织，从调整社会关系入手实现新的社会关系的建立。而调整社会关系的依据就是伦理。他对宋代“吕氏乡约”（亦称“蓝田乡约”）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乡约制度给予高度评价，在古代乡约基础上，他加以修订、扩充，以期形成新的社会组织，即“伦理本位合作组织”。^③ 他所倡导的“伦理合作”包括土地的合作利用。他主张取消土地私有权。他注意于“王田制”、“均田”、“限田”等运动不绝于中国历史，才出现两千年的相安局面，认为乡村建设应该“裁抑地主”，同时“奖励自耕农，保护佃农”，“做到没有凭藉土地所有权来行剥削的地主”，^④ 而这些以及一切的社会进步，要通过“改良”而不是“暴力”来实现。^⑤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体现着儒家的“稳健主义”而避免阶级革命的激进形式。他对同时出现于现代中国的两种社会改造

①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梁漱溟全集》第4卷。

② 《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453页。

③ 《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567页。

④ 《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531页。

⑤ 《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565页。